



东方学研究工作室

Encountering
The East



探索 『东方学』

曾庆盈 曾琼◎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东方学研究工作室

探索“东方学”

曾庆盈 曾 琼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索“东方学” / 曾庆盈, 曾琼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301-26283-2

I. ①探… II. ①曾… ②曾… III. ①东方学—研究 IV. ①K1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1240 号

书 名	探索“东方学” Tansuo “Dongfangxue”
著作责任者	曾庆盈 曾 琼 编
责任编辑	朱丽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283-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6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序 言

颜海英

“东方学研究方法论”课题组成立于2012年，旨在整理、提炼和推介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东方国家研究群体对于东方文化的认知，以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视角来揭示东方文化的深层内涵，促进中国与西方在学术层面的互动和理解。2012年4月至2014年10月，课题组基本完成了学科史的回顾与总结、专题研究特色的发掘等工作，并以实证研究方法、诠释学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跨文化研究方法四个研究小组进行了深度研讨。在此基础上，2014年5月15—17日课题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举行，邀请国内外东方学研究领域成就突出、独具特色的专家学者，结合他们各自的学术探索和实践，围绕四个议题展开讨论：

1. 东方学研究的方法论范式
2. 文学作品中的东方
3. 东方的历史与遗产
4. 跨学科研究中的东方

本书是此次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的汇总，也是课题组成员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展示。此次国际会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承前启后，对前一阶段的研究进行整理总结，听取各方学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规划，对研究重点和方向进行适度调整，在逐渐拓宽视野的过程中，不断凝聚东方学者的最新成果和智慧，使之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家之言，推动东方学研究的多元化。

“东方学研究方法论”的目标是以东方学者的视角发掘和展现东方文化的传统价值，对东方文化与现代思想的关系进行系统而科学的梳理和研究，在东方与西方、过去和现在之间搭建一个桥梁，既保持现代化的成就，同时也收获古代东方智慧的果实。随着全球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现代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被日益切断，失去了精神文化之根

和先祖那种天人合一的宏大宇宙观，在全球范围内，各个社会并没有对此偏离进行调整，而是逐渐迷失在现代化及物质主义的泛滥中，不再懂得传统价值观的珍贵之处。东方文化对于生命及其意义有整体而深刻的理解，这是现代科学所不能提供的。现代人不断陷入焦虑、迷茫和困惑中，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周期性地出现狂热怀旧，对古老观念和思想的迷信和沉迷。在这场弥漫全球的精神危机中，东方学者责无旁贷，要承担起诠释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大任，通过对东方文学和神话的形象、象征、寓意的深入剖析，对东方历史的全方位解读，用现代理论和话语解说古代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观念、文化和世界观。这种解说使得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在更高层次、更宽广的平台上进行，也使得复兴传统文化的美好愿望落到实处，不是简单庸俗地复制古代的礼仪和经典，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的前提下通过改造传统使之合理延续，这项工作，只有东方文化的研究者能够胜任。

“东方学研究方法论”的原则是坚持东方学研究的人文特色，跨越学科界限，融合人文和科学，走出近世以来学科碎片化的泥沼，迎接整合大潮的到来。以本体论的视角，将个人的整体生命和文化体验与其特定专项学术研究相结合，全面、综合、多层次地展开研究，在社会实践层面，才能避免以割裂化的方式来制定短视的政策，使得经济增长与文化发展相和谐。从这个意义上，“东方学研究方法论”是对学术界旷日持久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的反思，目的是超越二者的对立。在不同学科的各种方法的无休止争论中，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二元对立一直都是矛盾的根源，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这是一个根本上的哲学分歧，已经内置于学术研究体系内部，将之分为人文和科学、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两极，它们既争夺着社会的认可也争夺着研究经费。而学科的碎片化、研究领域的专业化也导致割裂化的思维，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随着学科分工细化，专家数量越来越多，他们的知识和方法越来越专业，习惯于甚至只会用自己熟悉的方法和理论来理解和诠释一切生活事件，生命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遇到视野狭窄、专业领域相互脱节的专家，常常爆出诸多的雷人雷语。打破学科壁垒，迈向整合思维，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

此次国际会议就是上述原则的最好实践，四个议题为研究领域和方法截然不同的各类专家提供了一个平台，大家既分享各自的案例研究和理论路径，也探讨普适性的原则如何在各自的领域运作，以不同的角度和

方法来探讨同一主题,发现重大概念的相同脉络。

黎跃进的《“东方学”与“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的构想》一文,继《认识“东方学”》论文集之后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东方学的学科特性和学术价值,该文提出要注意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东方学(即东方主义)和作为科学的学科的东方学的观点,对于客观认识东方学,避免和纠正曾经一股脑地将东方学简单地等同于东方主义的偏见,显然具有正面的和积极意义。该文同时设计出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方案,描绘了一幅中国东方学学科体系的蓝图,令人鼓舞,催人发奋。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狄伯杰博士,在《中国诗歌的印度语翻译:不可译还是文化上的失衡?》文中,对古代和近现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中文学互译的不对等现象,作出客观和冷静的分析,指出其原因为欧美中心主义、文化制约、语言难题、市场、双边关系以及中国文学文献来源不足,这其中“欧美中心主义”和“市场”两个因素特别让人寻味,即一个文化(价值)指向,一个经济(消费)选择,是东方主义的遗祸,还是后殖民主义的遭遇,让人费解,令人反思。论者在最后还是乐观地展示出中印文化交流、文学互译的可为前景,让人们有理由期待并走出困惑和焦虑的阴影。

北大外国语学院西亚系访问学者美籍教授阿姆鲁拉博士的《“噢,东就是东,西就是西”:跨文化理解的挑战》一文的精彩和精道之处是:通过关于东方和西方的不准确假设的例子,对普遍认可的东方与西方文化遗产及身份认同问题进行批判性剖析,从而揭示某些关于所谓东方、西方及两者互动的误导性解读。阿姆鲁拉从当代诠释学角度、结合后殖民主义思潮、以文化研究方法分析虚构的东方与西方,对“自我”与“他者”概念的想象与构建作出分析,为我们重新审视研究“东方”和“西方”的方法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见解。

与埃及学这个形成比较早的东方学分支学科相比,诸如蒙古学、朝鲜—韩国学、满学等相对年轻的东方学分支学科最近十几年的发展已经获得显学的地位。这些通过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语言、文献,研究其宗教、历史、政治、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学问,已经并正在以交织、互渗、跨际、观照的方式,为梳理这些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不断进行有益的尝试,提供新的视角和有意义的认识路径。本集刊载了刘广铭的《“燕行录”研究三论:价值、文献、视野及方法》可謂是这个领域的力作。论者通过对“燕行录”研究中的中国北方民族形象的个案,考察这些学科重叠的边缘

地带所出现的新的研究视角的演变轨迹,展望这些当代显学在知识全球化时代的科际整合与重构中的发展前景,强调指出这些学科的开放和对话,对于走出僵化的研究范式,追求学术创新,无疑会是有益的尝试,读者可以从文中翔实的史料、细致的分析和独到的论述,看到我国的东方学学者的治学功力。

刘英军发表在本集的文章《中国形象在波斯语古典叙事文学里的演变》,可谓是之前发表的《波斯语叙事诗里的中国形象浅析》的姊妹篇,这是一篇典型的“他者”叙事研究的考察。作者先对中国形象在波斯古典叙事文学中做了归类,接着分析了其成因和演变,继而是在伊朗民众集体记忆中的形象演变,然后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那就是与东方主义的“他者”形象相迥异,波斯语古典文献中书写的中国形象“被奇异化,甚至是美化了”,因为“与上古时期他们在伊朗高原立足过程中经历的同古闪族一些部族的血腥、残酷的斗争相比”,伊朗族群与东方各部族的冲突处于次要地位,中国的形象在波斯人的集体记忆里不同于“闪族入侵者形象在波斯语古典叙事文学作品里被丑化、妖魔化”,对此,作者认为这是“中立性的“误读”,或是“集体想象中的美化”。

戴鑫的论文《托勒密埃及的官方族群划分》从希腊移民特权的角度探讨希腊化问题,综合利用托勒密政府的税收记录和法律文书两方面的材料进行研究,采取了新的分类模式及研究视角,从而摆脱了国外同类研究对统计资料 and 数据的过度依赖。作者从纸草文献中提到的托勒密相关税收和法律登记法令入手,利用现有的学术成果,结合具体案例对税收人口登记进行再分类,并从家庭(户)和群体(籍)两个层面归纳和总结托勒密政府的人口管理和族群、职业登记模式,进一步探讨在这种以户籍为核心内容的税收和法律管理制度下,特权群体的确立和变迁。文中屡有创新亮点,如“虚拟希腊人身份”的发现,即托勒密统治者把希腊人身份作为特权给予非希腊人,等等。

本书所展现的成果,充分体现了跨学科整合的趋势,充满人文关怀的选题和视角,以及全面、综合、多层次展开研究,超越主观、客观二元对立的崭新尝试,在以下两个方面实现了东方学研究的新特征:

一是对“视域融合”的追求。视域融合只有在与不同的文化、传统、实践和行动的相互遭遇中方可达成。不同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或许是不能以同一标准来衡量的,但却可以理性地予以比较。当文化冲突发生时,通过有意地对两种视角和视野导致的不同观点进行循环往复的比较;面对

文本,在译者对文本的理解以及作者的本意这两者之间往返转换,一个文本不是作者最初创作,而是与不同时代对话的动态文本的一部分(“互文性”);面对历史,体会历史是历史学家与过往的对话;面对艺术品,则是诠释者和艺术品的创造者之间进行对话。在目光流转的过程中,理解在加深,共识在扩大。

二是加强理解现实的能力,通过理解,一种蜕变得以产生。在读者与文本互动、读者与读者互动、整体与部分互动、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互动、反思与文本互动中,把研究者自身的背景从局限变成优势。“理性被认为是历史的、有条件的理性,它在一个有生命的传统中获得力量(伯恩斯坦)。对异文化传统的研究可以发起对话,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形式和偏见。“只有通过他者,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自我。”

本课题的成果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造福社会。东方文化的原型是普世性的,扎根于各种文化之中,跨越文化的藩篱,在这种意义上,原型的存在证明了人类拥有着共同的遗产。对于所有文化和族群的共同基因的探寻,将有助于消除分歧、偏见和误解,将促成人们共建一个和谐的、和平的、全球化的世界,在目前世界格局下,这是最为迫切的需求。

目 录

东方学研究方法论探索

新丝绸之路与新文艺复兴

——21世纪及之后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 冯达旋(3)

“噢,东就是东,西就是西”:

跨文化理解的挑战 …………… [美] 阿姆鲁拉 张悠然译(9)

“东方学”与“中国东方学学术史”研究的构想 …………… 黎跃进(22)

中国东方学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 …………… 雷武铃(33)

中国诗歌的印度语翻译:

不可译还是文化上的失衡? …………… [印度] 狄伯杰 张婧译(38)

关于中国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的省思 …………… 郑 岩(47)

东方的历史与遗产

神圣时空下的古埃及早期王权 …………… 颜海英(57)

扬·阿斯曼关于古埃及文明与“轴心期”理论的研究 …………… 王 欢(72)

北魏贵族之生与死 …………… 曾庆盈(84)

“燕行录”研究三论:价值、文献、视野及方法

——以“燕行录”研究中的

中国北方民族形象为个案 …………… 刘广铭(101)

试论古代东方学研究的图像志 …………… 陈 明(113)

中国民族乐器的波斯源流

——琵琶、箜篌、唢呐入华小考 …………… 穆宏燕(126)

文学作品中的东方

文学、家庭和女性

- 以《妄稽》和《孔雀东南飞》的比较为例…………… 何 晋(139)
- 国内村上春树文学研究评述…………… 翁家慧(150)
- ### 细解西方对东方的误读
- 剖析《吉檀迦利》在英美的接受…………… 曾 琼(161)
- 菲律宾古代史诗中的神秘主义信仰研究…………… 吴杰伟(174)
- 中国形象在波斯语古典叙事文学里的演变…………… 刘英军(187)
- 索因卡与西方戏剧的关系…………… 刘 凌(198)

多维研究中的东方

- 融合与相斥:南亚印度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 刘曙雄(209)
- ### 伊斯兰:东方对于医学和科学
- 全球化的贡献…………… [美] 阿布德尔哈迪·哈拉瓦 马征译(215)
- 菲律宾阿拉安人二元对立的精神世界…………… 史 阳(236)
- 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文学局的流变…………… 孙晓萌(250)
- 丹德拉黄道表达的古埃及来世观念…………… 田 天(263)

东方的文化建构与身份认同

虚构与建构之间

- 浅论小说《虚假的事实》…………… 张 婧(289)
- 托勒密埃及的官方族群划分…………… 戴 鑫(300)
- “他者”视域下看“开罗三部曲”阿拉伯文化身份认同…………… 安 宇(316)
- ### 戈迪默文学中黑人与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 以《朱利的族人》《我儿子的故事》
《贝多芬是1/16的黑人》为例…………… 杜冰卉(326)
- 库切流散写作中的旁观者视角…………… 刘 骏(337)
- 附 录…………… 曾 琼(345)
- 后 记…………… (383)

东方学研究方法论探索

新丝绸之路与新文艺复兴

——21 世纪及之后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①

冯达旋

【作者简介】 冯达旋,教授,前新竹清华大学资深副校长,现为澳门大学全球事务总监兼校长特别助理。

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北京大学跟大家谈一谈我这两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英国的大文豪狄更斯写了一本名著《双城记》,里面开门见山就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我相信 21 世纪跟他所处的 19 世纪很相似。但是有一点却是非常不同的,那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变迁比 19 世纪所面临的变迁在速度上要快了好几个数量级。

大家把世界地图拿出来看一看,是否会产生这么一个疑问:这是北美洲,它看起来是一块完整的土地,所以我们很容易把它看成一个洲。南美洲也是一块很完整的土地。非洲也是一块很大并且很完整的土地。澳洲和新西兰,也就是大洋洲,更加是这样。但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却不明确,是人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一个原因是早期欧亚人口的分布主要是在这块大陆的极西部与极东部,以及南部,而中部人口稀少。我猜想这应该是人们把欧洲和亚洲分成两个洲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但是几千年来,无论是从文化、军事还是经济的角度出发,人类都希望把欧洲和亚洲联系起来。毫无疑问,“丝绸之路”的形成就是人类希望把欧亚联系起来最好的明证!

我想各位应该都注意到了 21 世纪的一个大型基础建设的发展,那就是建设亚洲高速铁路的普遍化,无论是在韩国、日本(20 世纪就已经开始

^① 本文由冯达旋教授在北京大学“对话·视野·方法:东方学国际研讨会”(2014 年 5 月 15—17 日)讲话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高铁的建设)或中国台湾,高速铁路的建设已经非常成熟,而中国大陆就更不用说了。同时,在本世纪内,亚洲的中部,比如哈萨克斯坦,也低调地加入了大力发展高铁建设的进程中。随着地域经济与政治上的成熟,我认为下一步很明显的发展就是开拓一条欧亚高铁。这条铁路我觉得可以把它看成是 21 世纪的“新丝绸之路”。毫无疑问,铁路交通与航空交通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铁路可以推动沿途的各种发展。所以欧亚高铁可以带动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空前改变。更重要的是人类对于“欧亚”这个概念一定会产生一个新思维,那就是处于欧亚大陆的人会慢慢感觉到他们是处在同一块超级大洲,而非今天具有局限性的亚洲和欧洲。各位,这可是一个千年的思维变迁呀!

大学作为人类思想的摇篮应该如何针对这一思维变迁做准备呢?我在去年有幸参加了一个历史性的会议后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今天在此与诸位分享一下我的初步理解。欧洲有一个由 23 所顶尖大学组成的联盟,叫“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亚洲有一个由 17 所顶尖大学组成的联盟,叫“东亚研究型大学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去年年底在台湾新竹开了一个由新竹清华大学主办的两大联盟的大学校长会议,这是两大洲重要大学的领导首次真正坐下来在连续两天的时间里围绕着大学的重要性及其构成等问题进行讨论,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很自然的,会议的主题是探讨 21 世纪欧洲和亚洲的高等教育要如何发展才能对全球人类负起责任,以及 21 世纪之后的大学发展前景等问题。

非常有趣的是这两个大学联盟的会员其实也体现了旧和新的比较。与会的欧洲大学都是在文艺复兴前后创办的,而亚洲的大学就晚了许多。最早的东京大学在 1877 年建校,其他的则都是近代创办的。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当今亚洲的大学都在竞争排名的冲击力下生存。许多大学的领导都感到莫名的压力,比如台湾某大学校长在他卸任的半小时发言中只提到他在任的排名功绩,“教育”这两个字完全不提。这些个别的亚洲大学除了大力推动排名的提升以外,作为高等学府它们能集体为人类做些什么贡献呢?这正是本世纪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欧洲和亚洲在思维与实际形成一个超级大洲时,大学能为人类文明做出什么贡献?在这个历史性的会议上,为了回答此问题,与会者就大学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提问。

欧洲的一些大学校长提到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无知”。以我的浅见,文艺复兴对人类非常重要的贡献是在欧洲普及了高等教育。

我们可通过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来展开我们对高等教育及其未来发展的思考。首先是列奥纳多·达·芬奇,文艺复兴早期的博学者。另外一位是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与他们十五六世纪的同仁已经为人类在美术、工程、医学、科学等领域开辟了崭新的知识层面。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文艺复兴时期四所大学的故事。这四所大学分别是波兰的雅盖隆大学、意大利的比萨大学、法国的亨利大帝皇家学院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比萨大学在1581年收了一名医科专业的学生,此人被今天在剑桥大学的伟大科学家史蒂芬·霍金称为自然科学的发起人,他就是伽利略。法国的亨利大帝皇家学院在1604年收了一名10岁的男童,在学校总共念了10年书,专攻数学和物理学,后来被称为几何学之父,他就是笛卡儿。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我思故我在”。波兰的雅盖隆大学在1491年收了一位名叫哥白尼的学生。该大学是以天文学和数学为主。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哥白尼用正确的科学方法证明了当时被普遍接受的地心说是错的,提出了日心学模型并且提倡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一观点。最后是英国的剑桥大学在1546年收了一个只有12岁的孩子叫弗朗西斯·培根。培根在剑桥大学就读神学、逻辑学、数学、天文学、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些教育奠定了培根后来成为英国的散文大师、法学家、哲学家以及政治学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也成为了古典经验论的始祖及工业科学的哲学家。他的两句名言“真理是时间的产物,不是权威的产物”以及“合理安排时间就是节约时间”到今天还完全适用。在1661年,剑桥大学又收了一位叫做牛顿的18岁青年。在大学里,牛顿喜欢阅读笛卡儿的现代哲学及伽利略、哥白尼的天文学,而他自己则在1665年发明了微积分,1687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也就是今天我们学的三大运动定律。

我常说,看了牛顿就感到老天爷对我们中国人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我们不确定牛顿到底是哪一年生的(有些人说他是1642年的圣诞节晚上出生的,也有人说是几天后的1643年生的),无论如何,随着他的出生,老天爷送给了西方一位科学方法的开山祖师。而一年之后的1644年,老天爷给中国送来了顺治皇帝。顺治代表的是封建政治系统的延续,而到

了乾隆年间,清政府就开始实施全面闭关锁国政策。锁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

那么几百年的文艺复兴的精髓是什么?是不是在这个期间诞生了比如我刚才列举的那几个划时代的例子,完成了改变人类思维的突破?毋庸置疑,文艺复兴时期的确有人完成划时代工作,但那并非是精髓。据我看来,其精髓如下:文艺复兴对人类的贡献在于对追求事实和真理的不妥协。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空前、最伟大的社会运动:在欧洲大陆普遍设立大学,让千千万万的学子有效地、有系统地推动人类对自然界、对文化更深以及更正确的认识。

大家想一想,牛顿在大学里,有许多同学跟他学习同样的课程。虽然这些同学未在史上留名,但是他们也肯定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属于他们的贡献。对我来说,这就是大学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贡献。我们通常不会想到这一点。我们一般只想到牛顿的伟大,但是我们不会想到牛顿念书的时候必定要与他的同学、老师讨论,甚至辩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深信这种教育和思辨方式必定对牛顿日后完成伟大的工作有一定,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大学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文艺复兴时的大学改善了人类的未来。

到了21世纪,西方和东方的大学都有一个神圣的任务,那就是培养为人类服务的好公民。对研究型大学,这个任务就更重了,那就是如何为全人类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导。亚洲的高等教育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开始转变。转变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有两个重大历史事件对这个转变有不可否认的推动作用:第一个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第二个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但是亚洲大学由教学到研究的转变则要等到20世纪的下半叶,甚至到20世纪末期才真正地开始。

要使亚洲的大学由教学型转变成研究型,其所需要的条件也是多维的,需要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成熟度。在亚洲,研究型大学这个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在20世纪末及21世纪初期才真正开始的。今天,亚洲的大学的确是起飞了,而亚洲当今的大学生更要挑起为全球克服困难的重担。要能挑此重担,首先就要拥有“内在自信”。

19世纪欧洲的青年人沉浸在伟大的创造时代,当时的他们一定有强大的内在自信。20世纪的美国青年人,也同样满怀浩瀚的内在自信、回应罗伯特·肯尼迪的豪言,“有些人看到一件事情时会问为什么,而我梦想着有一天人们都会说:为什么不呢。”那么在21世纪,亚洲的青年能不

能怀有同样强大的内在自信？

几个月前，我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做了一个相同的演讲。有一个非常有思想的同学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认为在欧亚超级大洲的思维中，我们亚洲的大学可以贡献什么？”这个问题令我深思。

自 20 世纪以来，亚洲看到欧洲科技绝对领先的地位，就几乎全心全意在科技上追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亚洲的高校多多少少都是以理工领航。但是回顾文艺复兴时期，我们看到理工的发展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基础的。显然，科学技术我们可以追赶上，但是要在思维上有质的超越还将面临很大的挑战。

我们了解到，文艺复兴时期大学的普遍化最重要的一个成果是克服人类当时的一大挑战，也就是无知。今天人类的大挑战已经不仅仅是无知了。今天的挑战是缺水、缺能、贫穷、无知、疾病、贪污以及人口暴增。要克服这些挑战所需要的工具是超越科技的。今天需要的工具就是要对人的行为有深刻的认识，要能够推行完善的公共政策同时拥有政治勇气。今天人类面临的挑战是文艺复兴时期不可想象的。虽然在进入 21 世纪的这十几年内人类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但是从深度和广度来看，仍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我认为位于由欧洲和亚洲组成的“超级大洲”的大学可以融合东方和西方千年的文化以解决人类当下面临的挑战，同时创造出比文艺复兴时期更伟大的大师。我刚才所提到的文艺复兴的大师全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基础发展出他们的工作。今天在“超级大洲”的我们可以把东、西方文化放在一起发展，培养出新的牛顿、新的伽利略、新的笛卡儿和新的培根。他们会提出跨世纪的新方案来克服人类面临的挑战。正如文艺复兴时，这些伟人可以来自任何一个处于“超级大洲”的大学，成长在这个“超级大洲”的年轻人也会有很丰富而且很强大的内在自信。那就标志着“新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的创新。

2008 年，全球面临经济恐慌。2009 年，台湾的成功大学为亚洲发展银行开了一个以“全球经济危机工业重整”为题的大型会议。他们请我做总结，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在整个 20 世纪中，亚洲在心理上是跟西方紧紧地耦合在一块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西方有超前的经济和学术力量，自然地亚洲会认为它是卓越的标准。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周期，当西方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的弱点后，很可能在全球经济体制的现状下，亚洲有机会跟西方脱钩。我绝对不是建议亚洲应该在经济